

# 章太炎與因明學

沈海波 撰



# 目次

【壹】前言

【貳】在友人影響下初習因明

【參】對因明學的重視與研究

【肆】運用因明學進行論戰

【伍】小結

## 【壹】前言

章太炎早年專攻經學，對於佛學的興趣并不大。以後在朋友們的勸引下，方才對佛典有所涉獵。章太炎在《瑞安孫先生傷辭》中回憶說：

平子（即宋恕，浙江平陽人——筆者注）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喜《寶積經》。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sup>1</sup>

宋恕曾對他說：「何不取“三論”讀之」。「三論」指的是《中論》、《十二門論》、《百論》這三部龍樹系的大乘典籍。結果，章太炎：「讀竟，亦不甚好」。<sup>2</sup>

但是，章太炎自蘇報案被繫入獄以後，即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那龐雜的哲學體系中也逐漸溶入了佛學思想的成份。他在對佛學思想進行大量吸收的同時，對佛家邏輯——因明學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章太炎有關因明學方面的論述雖然並不多，但是他對因明學的重視程度卻是極高的，而且經常對因明學的理論加以運用。本文試就章太炎與因明學的關係問題略作論述。

---

<sup>1</sup> 《章太炎全集》（四）P22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sup>2</sup>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897 年條。

## 【貳】在友人影響下初習因明

章太炎早年執著於經世致用，所以雖有朋友們的勸導，卻始終不能醉心於佛學。章太炎自述說：

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獨於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自余閑眇之旨，未暇深察；繼閱佛藏，涉獵《華嚴》、《法華》、《涅槃》諸經，義解漸深，卒未窺其究竟。<sup>3</sup>

又說：

余少年獨治經史通典諸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不好宋學，尤無意於釋氏。三十歲頃，與宋平子交，平子勸讀佛書，始觀《涅槃》、《維摩詰》、《起信論》、《華嚴》、《法華》諸書，漸及玄門，而未有所專精也。<sup>4</sup>

1903年，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拘押獄中後，逐漸醉心於佛學，主要閱讀了《瑜珈師地論》、《成唯識論》等大乘法相宗典籍，其中也包括了《因明入正理論》。由此他初步研習了因明學的理論。

章太炎在獄中閱讀這些法相宗的經典著作，與朋友們對他的影響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原先勸章太炎學佛的宋恕，對唯識學素有研究，並且特別對因明學進行過大力的提倡。章太炎自修習唯識學後便將其引為知音。他回憶說：

---

<sup>3</sup> 《蓀漢微言》。

<sup>4</sup> 《自述學述次第》。

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珈》竊自喜，以為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sup>5</sup>

此外，早年勸章太炎“購覽”佛經的夏曾佑，對法相宗也極為推崇。與章太炎過往密切的友人中，不乏像宋恕，夏曾佑這樣喜歡談佛論道者。所以，當章太炎被繫入獄後，朋友們便設法為他送去了法相宗的經典著作。蔣維喬回憶說：

二人（指章太炎與鄒容——筆者注）初繫福州路工部局，禁令尚寬，每周可容親友前去探視一次。中國教育會在滬同人，約定以二人輪值，前往探問送食物，太炎索閱《瑜珈師地論》，是書當時上海尚無處可購，惟蔣智由寄存於會中書篋內有之，乃設法取出，送與太炎。<sup>6</sup>

章太炎在獄中誦讀法相宗的經典，不能不說是受了朋友們的影響。也正是由於入獄這一機緣，章太炎才得以在友人的幫助下，潛心探究佛理，最終悟解了大乘的法義。章太炎自己回憶說：

獄吏課以裁縫役作。友人或求納致書籍，獄吏許之。始余嘗觀《因明入正理論》，在日本購得《瑜珈師地論》，煩擾未卒讀，羈時友人來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役畢，晨夜誦讀，乃悟大乘法義。<sup>7</sup>

---

<sup>5</sup> 同(1)。

<sup>6</sup> 《章太炎先生秩事》，《制言》第25期。

<sup>7</sup>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04年條。

章太炎在獄中一邊自己研讀佛典，一邊傳授鄒容。他不僅悟透了大乘法義，而且對因明學的玄妙之處也有了深切的體會。章太炎曾特別向鄒容推薦《因明入正理論》，云：「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sup>8</sup>

## 【參】對因明學的重視與研究

1906年，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後，對因明學繼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09年，他撰寫了《原名》一文，運用因明學的理論，對《墨經》的邏輯體系進行了比較研究，較為集中地反映了他對因明學的研究心得。他致書國粹學報社，自述撰寫《原名》一文的緣起時說：

向時無知因明者，亦無有求法相者，歐洲論理學復未流入，其專以形學、力學說《墨經》，宜也。今則舊藉多已刊印，新譯亦時時出，而學者不能以是校理《墨經》，觀其同異。蓋信新譯者不覽周、秦諸子，讀因明者亦以文義艱深置之，而《墨經》艱深，又與因明相若，因無有參會者。僕於此事，差有一長，不以深言比博，惟取真相契當之文為之證解，其異者亦明著之，如宗因喻之次第，彼此互異……<sup>9</sup>

章太炎運用因明學對《墨經》進行比較研究，是他的一大創舉。所以這篇《原名》在《墨經》研究史上可說是開先河之

<sup>8</sup> 《鄒容傳》，《民報》第 19 號。

<sup>9</sup> 《致國粹學報社書》，《國粹學報》第 11 號。

作，也顯示出了章太炎對因明學研究之深入。

章太炎對因明學重視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數端：

其一，對印度文化的傾心。章太炎自到日本後，一方面閱讀了大量的佛典，一方面也接觸了許多遊學日本的印度人，由此他開始傾心於印度的古代文化。章太炎對梵文非常欣賞，他曾致信蘇曼殊說：

我亞洲語言文字，漢文而外，梵文及亞拉伯文最為成就，而梵文尤微妙，若得輸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於亞洲和親之局，亦多關係，望師一意事此，斯為至幸。<sup>10</sup>

章氏曾特地請了一位梵文教師來開課教習，并約請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前去聽講。<sup>11</sup>章氏還曾與蘇曼殊商議設立梵文書藏，因無有應者，“卒未成”。<sup>12</sup>此皆足見章氏對梵文之重視程度。

章太炎對於婆羅門學說也進行過研究，并和印度婆羅門學者有所交往。他在致蘇曼殊的信中說：

有羅浮山寶積寺沙門名娑羅者。航海來日本，特訪師於民報社。蓋娑羅在廣東見警告書，故不遠萬里，求善知識。師本意欲往羅浮，又譯《婆羅海濱遁跡記》，今皆應驗，所謂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者與？娑羅素學禪觀，與啞羊輩大異，在橫濱曾講經一月，今寓鎌倉建長寺，彼寺則日本臨濟第一招提，其僧

---

<sup>10</sup> 冬藏《章太炎與曼殊和尚》，《越風》第17期。

<sup>11</sup> 周作人《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越風》第1期。

<sup>12</sup> 同(10)。

亦尚少真宗臭味也。末底近方托印度友人轉購波彌尼八部書，其書到後，當就師講解。<sup>13</sup>

章太炎還準備介紹一位印度婆羅門的學者來中國講授吠檀多哲學，他作書余同伯曰：

頃有印度婆羅門師，欲至中土傳吠檀多哲學，其人名蘇蕤奢婆弱，以中土未傳吠檀多派，而摩訶衍那之書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殘，故懇懇以交輸智識為念。某等詳婆羅門正宗之教本為大乘先聲，中間或相攻伐，近則佛教與婆羅門教漸已合為一家，得此挾掖，聖教當為一振。<sup>14</sup>

章氏的這番議論在正統的佛學家眼中，完全是離經叛道的，所以楊仁山代余同伯作書答曰：「今當末法之時，而以婆羅門與佛教合為一家，是混亂正法而漸入於滅亡」。<sup>15</sup>

章太炎在革命受到挫折時，甚至一度產生了到印度出家的念頭。黃侃回憶說：「（太炎先生）睹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為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sup>16</sup>章太炎自己也曾說道：「余自三十歲後，便懷出世之念，宿障所纏，未得自在」。<sup>17</sup>蘇曼殊也說：「前太炎有信來，命曼隨行，南入印度，現路費未足，未能預定行期」。<sup>18</sup>

---

<sup>13</sup> 同(10)。

<sup>14</sup> 《致余同伯函》，見《楊仁山居士遺集、等不等觀雜錄》卷 8。

<sup>15</sup> 《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書》，《楊仁山居士遺集、等不等觀雜錄》卷 8。

<sup>16</sup> 《太炎先生行事記》，《制言》第 31 期。

<sup>17</sup> 《贈曼殊自題小影》，見冬藏《章太炎與曼殊和尚》，《越風》第 17 期。

<sup>18</sup> 《致劉三書》，《曼殊全集》（一）P197。

正是由於章太炎醉心於印度文化，所以他在將印度、中國和西方的三種邏輯體系進行比較研究時，對因明學便表現出了特別的偏愛。章太炎曾經論述道：

辯說之道，先見其情，次明其抵，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因明所謂宗、因、喻也。印度之辯：初宗、次因、次喻。大秦（指西方——筆者注）之辯：初喻體，次因，次宗；其為三支比量一矣。《墨經》以因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體，次宗；悉異印度、大秦…大秦與墨子者，其量皆先喻體後宗，先喻體者，無所容喻依，斯其短於因明立量者常則也。<sup>19</sup>

他認為印度的因明論式與辯說之道最為吻合，所以因明比較其餘兩種論式就顯得較為完美了。評價非常之高。不過，他的這個結論是有所偏頗的，因為以《墨經》為例，其論式雖不如因明論式那樣成熟，但在對論題進行論證的過程中都用具體事例來設譬，并不如章太炎所說「無所容喻依」。《中國邏輯史·近代卷》指出：“章太炎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種疏漏，並不是由於什麼粗心大意，而是根源於他對印度邏輯的偏愛，偏愛便使他夾雜著一些非科學的態度”。<sup>20</sup>這是合乎事實的分析。

其二，對法相宗的推崇。章太炎自從讀過《瑜珈師地論》、《成唯識論》等法相宗的著作以後，認為法相宗與自己所治樸

---

<sup>19</sup> 《國故論衡·原名》。

<sup>20</sup> 《中國邏輯史·近代卷》P226，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學極為相似，而其理論則遠遠超過了周秦諸子。因此他對於法相宗是格外欣賞的。他說：

及囚繫上海，三歲不覲，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於契機。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私謂釋迦玄言，出過晚周諸子不可計數，程、朱以下，尤不足論。<sup>21</sup>

章太炎在主編《民報》期間，一再提倡佛教，主張“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在佛學眾多的宗派中，他特別推崇法相宗。章氏在剛到東京時的演說中說：

這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并非實在真有…在哲學上今日也最相宜。<sup>22</sup>

後來他又發表了《建立宗教論》，認為“今之立教”，應以唯識宗為宗，“特不執一己為我，因以眾生為我”，“故一切以利益眾生為念。其教以證得涅槃為目的，等而下之，則財施無畏施等，亦與任俠宋、墨所為不異。乃有自捨頭目腦髓以供眾啖者”。<sup>23</sup>

1907年1月，章太炎發表《無我論》，他在文中特地解釋了自己所以提倡佛學的原因，他說：

民德衰頹，於今為甚，姬孔遺言，無復挽回之力，即理學亦不

---

<sup>21</sup> 《荀漢微言》。

<sup>22</sup> 《演說錄》，《民報》第6號。

<sup>23</sup> 《民報》第9號。

足以持世。且學說日新，智慧增長，而主張競爭者，流入“害為正法論”；主張功利者，流入“順世外道論”。惡慧既深，道德日敗…自非法相之理，華嚴之行，必不能制惡見而清汙浴。<sup>24</sup>

為什麼章太炎對法相宗如此情有獨鍾呢？他解釋說：

僕所獨尊法相者，則自有說。蓋近代學術漸趨實事求是之途。自漢學諸公，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矣。是故法相之學，於明代則不宜，於近代則甚適。由學術所趣然也。<sup>25</sup>

法相宗的理論條理分明，嚴謹有序，所以在近代愈益講求科學的時代，反而能夠顯示出其生命力，這是章太炎“獨尊法相”的主要原因。

研究法相宗的理論，自然需要掌握其最基本的方法論。既然章太炎如此推崇法相宗，那他對因明學的重視也在情理之中了。

## 【肆】運用因明學進行論戰

本世紀初，革命黨與維新派為了宣傳各自的政治主張，擴大各自的勢力和影響，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章太炎主持《民報》時期，正是《民報》同《新民叢報》之間的論戰達到

---

<sup>24</sup> 《民報》第 11 號。

<sup>25</sup> 《答鐵錚》，《民報》第 14 號。

頂峰的時候。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大量針對《新民叢報》的文章，並最終在論戰中占據了上風。

出於論戰的需要，論辯雙方都要盡可能地抓住對手的謬誤，並且不讓自己的議論露出破綻，這就要求論辯雙方掌握高超的辯論技巧——邏輯學。梁啟超很早就對邏輯學進行過研究，他於1902年所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

論理者，講學家之劍胄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亞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處，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土。<sup>26</sup>

可見梁啟超對邏輯學是較為重視的。此後，梁啟超又於1904年撰寫《墨子之論理學》，對邏輯學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對於梁啟超之所長，章太炎當然是非常了解的。為了能在論戰中立於不敗之地，章太炎並不僅僅滿足於閱讀一部《因明入正理論》，他還廣泛研讀了西方的邏輯學著作。因此他對於亞里士多德、培根、穆勒等西方邏輯史上代表人物的學說都有所了解。他說：

既東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輒讀藏經，又取魏譯

<sup>26</sup> 《飲冰室文集》之七 P33—34，中華書局 1989 年 3 月版。

《楞伽》及《密嚴》誦之，參以康德、蕭賓訶爾之書，益信玄理無過《楞伽》、《瑜珈》者。<sup>27</sup>

對印度文化的偏愛，使他更傾向於接受佛學理論而非西方思想。同樣在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中，章太炎經過比較後也認為因明學的論式是最完美的。因此，章太炎在他的辯論駁難的文章中，便運用了因明學這一論戰的武器，並在有意無意之間，使用了許多因明學方面的概念。

如章太炎在《無神論》中說：「嘗試論之曰：若萬物必有作者，則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極之，至於無窮。然則神造萬物，亦必被造於他，他又被造於他，此因明所謂‘犯無窮過’者，以此斷之，則無神可知已」。<sup>28</sup>他在《人無我論》中說：「世間現有見石而認為虎，見繩而認為蛇者，亦有見彼沃明蜃蛤等物而認為石子者，亦有見孔子而認為陽貨者。公言此想不起，即是遮撥現量，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此有情想，為取現量義，為取比量義耶？若取現量義者，惟形色領受名號作業心識五事，是現量得，而我非現量得，不應道理。若取比量義者，如彼嬰兒，未能思度，何緣率爾而起我想」。<sup>29</sup>章太炎運用因明學的理論和術語對自己的觀點進行論證，因此也就顯得較有說服力。

---

<sup>27</sup> 《自述學術次第》。

<sup>28</sup> 《民報》第 8 號。

<sup>29</sup> 《民報》第 11 號。

又如章太炎在《五無論》中說：「今之人不敢為遁天之民，隨順有邊，則不得不有國，亦不得不有政府，國家與政府，其界域固狹隘，故推其原以得民族主義，其界域亦狹隘，以民族主義為狹隘而不適於國家者，斯謂‘有法自相相違’不成比量」。他於此自注曰：“如三支法，彼先立一量云：‘民族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強分界故，喻如宗法思想’。此亦可以立一量云：‘國家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強分界故，喻如村落思想’。兩因復陳皆同，則前者所以破故，亦即所以自破。若作三段法亦得”。<sup>30</sup>雖然他說「若作三段法亦得」，但他還是運用了因明的三支法來進行推理，以宣揚他的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五無思想。

由於因明學在當時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通曉，所以許多人都對章太炎在文章中使用大量法相宗的專用名詞感到不滿，認為“佛書梵語，暗昧難解，不甚適於眾生”。章太炎對此辯解道：

余復自檢，梵語譯音之字，大略無幾…此略讀書者所共曉，故下筆亦多隨意。其餘固漢語耳，古德譯義，或有參差，悉以莛公為正。法相宗名詞深細，固非人人盡曉，有時亦或加注。其可以通俗語相代者，隨分增移，頗自矜慎。竊以報章之作，普示國民，震旦雖衰，碩學膚敏之士，猶不遽絕，一二名詞，豈

---

<sup>30</sup> 《民報》第16號。

遂為其障礙。若欲取諧時俗，則非獨內典為然，即他書亦多難解者。苟取便宜，失其本意，所不為也。

章氏於此自注曰：“如日本村上專精欲改因明之喻體喻依為理喻事喻，較諸原文，殊易了解。不知喻體本非是喻，今以理喻為名翻其反矣”。<sup>31</sup>說得振振有詞，一時讓人難以反駁。其實，章太章的那些政論文中，完全不必要去套用那些生僻的語句，歸根結底他是為了顯示自己學識的淵博才如此行文的。而他的這種做法，也確實使得那些對因明學毫無研究的論戰對手們一一敗下陣去。

## 【伍】小結

在近代中國思想啟蒙時期，邏輯學成為思想家們進行宣傳論辯的有力武器，章太炎憑藉其淵博的知識，有效地運用了佛家的邏輯理論——因明學，使其成為革命黨的領袖人物。因此，可以說章太炎與因明學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是其闡發自己思想的基本工具

---

<sup>31</sup> 《人無我論》，《民報》第 11 號。